

華人資本如何在 東南亞扭轉乾坤

• 佐治希斯 (George Hicks)

世界上大約有一百五十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真正能取得進展的，幾乎全部都深受中國文化影響。

傳統與變通

四小龍中——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就有三個是華人社會。此外，泰國和馬來西亞經濟頗為蓬勃，屬第二階梯的國家，華人在其經濟方面的影響也是舉足輕重。然而，歷史上華人移民大部分都曾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在一些地區，他們屬於少數民族，飽受當地殖民地政府和本土政府的種族歧視。他們沒有祖國作為後盾，政治上受壓逼，而且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民族衝突、技術困難和資金困難。雖然如此，他們最終戰勝了這些困難。以航運業為例，十九世紀末，歐洲的蒸氣船壟斷了東南亞地區

內的航運貿易^①，把傳統的中國沙船完全逐出市場。今日，李嘉誠的貨櫃碼頭——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在技術和吞吐量上，遠遠超過了紐約或利物浦的同類碼頭，世界上能與香港相比的，除了鹿特丹外，只有另一個華人國家新加坡。此外，李嘉誠在1991年還取得了英國費力克斯托碼頭 (Felixstowe Port) 的控制性股權。當代華人航運界鉅子的成績，充分證明華人絕對可以扭轉乾坤，在西方的遊戲規則下擊敗西方！

自前殖民地時代到現在，東南亞華人在所屬地區取得經濟上的支配地位，全賴一個共通的模式：他們遵照中國人傳統的經商方法，任用家族和同鄉，並恪守華夏文化規範。這樣，他們的生意愈做愈大，在不同政權的不同壓力下，靈活變通，應付自如。例如，如果法律禁止債主沒收欠債人的土地，華人債主便徵收欠債人的莊稼；如果法律禁止華人涉足某些行業，華人便聘用本地人出面主持，自

當代華人航運界鉅子的成績，充分證明華人絕對可以扭轉乾坤，在西方的遊戲規則下擊敗西方！

己做後台老闆(例如在泰國、菲律賓和印尼)②。華人成為政府和人民之間、經濟活動上不可或缺的中間人，活動範圍包括一般的專利包稅行業③而至極重要的國防企業(例如在泰國、印尼和其他地方)④。這些做法的具體過程，在在反映出華人獨特的運營風格。在西方科技和教育的影響下，在國內和國際經濟結構不斷變化的情況下，華人的經營模式也與時俱進，其間的變與不變，都深具意義。一般經濟學家論及東南亞時，都很少注意到華人，我們缺乏一種有關民族的經濟理論(托瑪斯·索韋爾是個例外，他對少數民族的國際性研究包括了海外華人⑤)。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常奢言中國人缺乏經濟知識，卻沒有考慮到特殊政策對華人的各種制約。因此，研究大規模經濟變遷對東南亞各民族平衡的影響，其實深具學術價值。

華人經濟力量的發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東南亞華人的發展很大程度是外界力量的產物。在十七、十八世紀，東南亞的重商政權對華人都充滿敵意，如西班牙治下的菲律賓和荷蘭治下的印尼，均仇視華人所得到的經濟利益。十九世紀，英國勢力影響所及的地方，自由貿易制度紛紛出現，一同出現的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促使大量窮困的中國人流入東南亞找生活。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英國的殖民地系統(被英國武力宰制，奉行英式經濟哲學的地區)為苦力勞工和商業買辦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市場。

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發展對華人

有利也有弊。誠然，在前述的航運業，歐洲人在航運業的優勢是一個例子，又如在馬來亞的錫冶煉業，歐洲人便是用資本密集的新技術從華人手中搶得壟斷權的，但那只是「弊」的一面。新技術令某些行業萎縮，可是卻同時提供了更多的新機會。再以航運業為例，在地區性航道上，蒸氣船取代了舢板，大大增強了貨運的安全程度和運載能力，為本地的水道交通、轉口和裝卸業創造了大量發展機會。新技術首先需要新的人材和設備，其次它還對運輸、貿易和借貸等行業——簡言之，即華人擅長的服務性行業——有新的需求。

對日戰爭期間，歐洲人的航運優勢根本發揮不出來。大船只會成為顯著的攻擊目標，於是數以千計的華人以舢板秘密從事高利潤的運輸業，往來於馬來亞—新加坡—印尼之間。戰爭以後，印尼華人備受排斥，難以正常經商，他們有些人和共和政體支持者合作，從事反殖民主義的貿易和航運。這是當代印尼華人一本本地人、公民一軍隊之聯盟的萌芽(Twang Peck Yang就是一個極有說服力的例子)。此外，其中更有不少發展成今日的航運和貿易王國⑥。

東南亞的非殖民地化帶來新的形勢和衝突。在東南亞，社會主義的影響較弱，不像非洲和印度那樣佔主導地位，但要求矯正民族間經濟不平等的力量卻相當強。戰後的東南亞，常常糾纏在兩種拉力之中：一種是希望自由進入國際市場(結果是增加國民產值)；另一種是希望重新分配不同民族的經濟利益(結果是限定甚至減少國民產值)。大部分國家嘗試同時追求兩項目標，其中有部分可以算是成功的。這是因為戰前殖民地的剝削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常奢言中國人缺乏經濟知識，卻沒有考慮到特殊政策對華人的各種制約。

經濟以輸出剩餘價值為特色，大量資金外流，民族主義的新政府則採取相反的政策。

新政府通過外資企業國有化和進口替代政策來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重新分配收入，在這個過程中，受損害的是外國人和華僑。（本來進口替代政策不一定只對本土人有利，但因為這種政策需要政府介入和協調，而政府又總想方設法去讓本土資本家壟斷，結果自然是一面倒：出口導向政策則相反，誰的生產效率最高，誰就最有經濟權力——他們通常是華僑和外國資本家。）新政府所取得的資源現在用來滿足本土的精英。在這種環境下，對政策制定者來說，用財產國有化和入口許可證等手段來排斥華人是毫無困難的。以往外國人和華僑原有的經濟利益現在轉向本土資本家。這些本土資本家正在孜孜學習舊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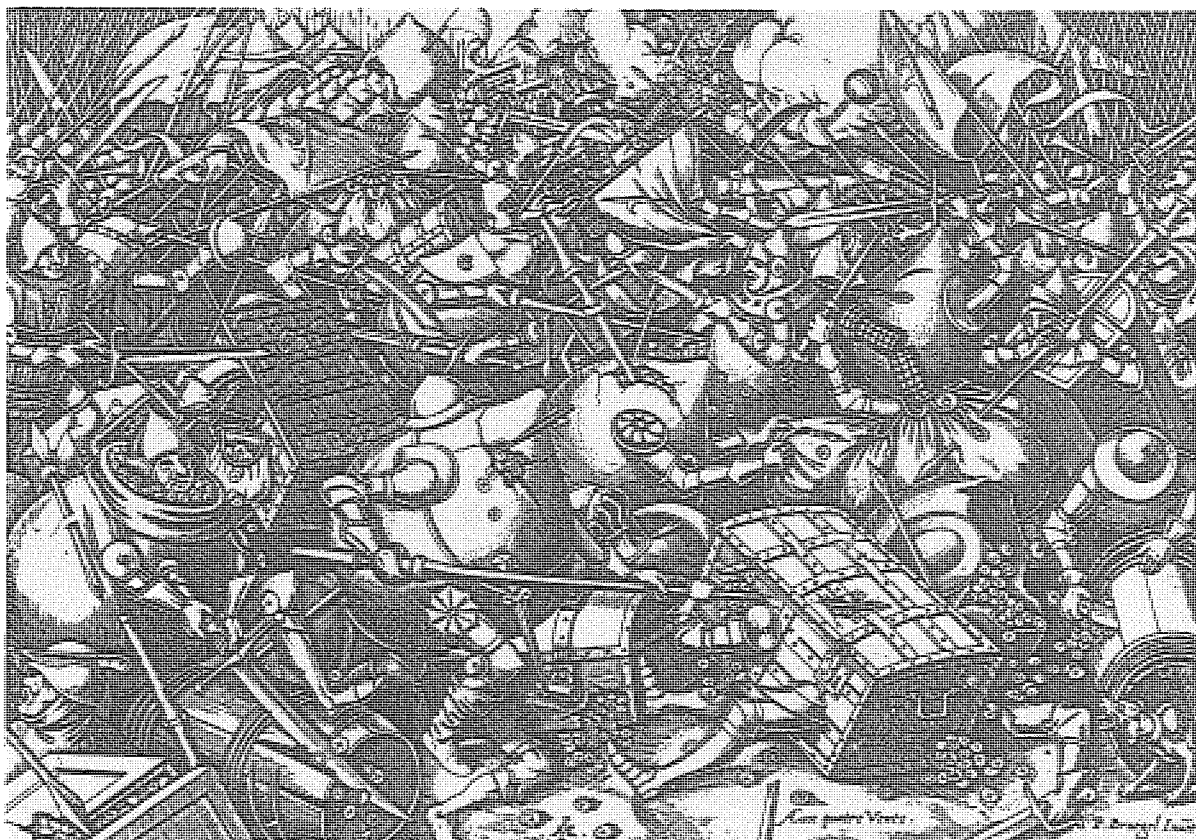
主人的消費模式。

到70年代（在馬來西亞是80年代），新的經濟環境出現了。在這些細小受保護的市場，製造業和裝配業很快發展到極限了，而且也再沒流向華僑和外資的紅利可供沒收了。進口替代政策很快就完成了歷史使命。

曾經實行了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政策現在證明是沒有出路的。除了最遲鈍的人以外，所有人都認識到，慢慢改變進口替代的保護結構，轉移到更開放的出口導向經濟，是不可避免的了。經濟政策的轉變帶來一個很重要的後果：民族經濟權力的再分配。歧視華人的懲罰性經濟條款再不能假裝是合理的了。當全球性的科技發展愈來愈快，世界各國愈來愈開放自由時，選擇是非此即彼的：要麼便實行自由政策，放棄歧視；要麼便被趕出現代世界。

新政府通過外資企業國有化和進口替代政策來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重新分配收入，在這個過程中，受損害的是外國人和華僑。

最重要的是自由競爭。



壯麗的前景

要評價新近崛起的東南亞貿易集團和找出誰是這些集團真正的控制者，經濟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應該可以提供背景，而最近在這些地區草擬的社會條款和投資規定也可以提供有用的參考：

- 1991年菲律賓有效地放寬了投資法例裏有關財產佔有權的規定，開放了原先只准本土人參預的發展性項目⑦。
- 在印度尼西亞，雖然有壓力要求華人企業集團必須售賣25%的股份給本土的合作社，並須與小的本土商業建立某種聯營關係，但是最近已廢除了禁用中國文字和禁辦華文學校（或許應叫國際學校，因為只可以取這樣的名稱）的命令⑧。
- 在馬來西亞，旨在強化本土民族經濟力量的NEC政策已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新政策強調的是經濟效果而不是社會結構的重整⑨。
- 越南現在正跟國內的華人和解，1991年初還准許中國外交人員和河內及Cholon的華僑接觸——這是15年來的首次。越南政府主動地向泰國和香港的華人工業家招手，希望他們到越南設廠和把生產外發承包轉到越南去。現時在越南的20億美元外國投資中，香港和台灣就已佔了6億6千9百萬⑩。
- 在喬森潘政權統治生存下來的柬埔寨華人，已重新開始從事工、商業。他們跟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泰國都有利益連繫⑪。
- 儘管緬甸是個極權國家，但在1988年，緬甸開放市場給外國投資。現在泰國資本已取代日本成為緬甸的最大外國投資者⑫。

海外華人在主導了全部亞洲經濟之後，為了繼續發展，正藉着鉅額的流動華資，着手把不同的經濟領域結連成一個龐大的經濟力量。

表面上，上述措施適用於所有外國投資者，然而，眾所周知，由於考慮到華人在投資方面的潛力，最近，東南亞各國對國外華人投資者的態度和管制確是軟化了。從統計數字可以知道，現時最大的國外投資者來自四個國家或地區：日本、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其中三個是華人國家或地區。總括而言，在航運業、建造業、酒店業和一般貿易等重要領域，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各國中最大投資集團將會是華人集團（新加坡除外）。

我們將會看見一個壯麗的前景：利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這個現代基地的海外華人，將匯同在整個地區中已經取得主導地位的其他海外華人，慢慢形成一個緊密的經濟實體⑬。海外華人在主導了全部亞洲經濟之後，為了繼續發展，正藉着鉅額的流動華資，着手把不同的經濟領域結連成一個龐大的經濟力量。

現時很難估計這個新形勢對東盟各國之間的內部關係、東盟跟日本的關係，與及更直接的跟中國的關係將有甚麼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已沒有明確的標準去把投資劃分成本國內的、地區性的和國際性的了。至於華僑與本土人的關係，鑑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權問題愈來愈受大眾關注，與及國內經濟結構轉為強調出口導向，要對華人繼續施行懲罰性的歧視政策，代價之高昂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了。正是基於這種外圍環境和內部結構的轉變——而不是因為種族偏見減少了或者民族同化增加了——使華人能夠打垮舊體系，而那些迫害華人的政策亦將成為歷史的陳迹。

註釋

① G.C. Allen and Audrey Donithorne: *Western Enterprise in Indonesia and Malaya: A Stud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Y: The Macmillan Co., 1957), p. 213.

② Akira Suehiro: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1985*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89), pp. 133–34. 另參註①書，頁239。與及 Jonh T. Omohundro: *Chinese Merchant Families in Iloilo: Commerce and Kin in a Central Philippine City*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5–36.

③ Richard Robiso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6, 1990), pp. 18–20. 另參註② Suehiro書，頁72–83。與及 M.J. Murra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ochina (1870–198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74–76.

④ 同註② Suehiro書，頁146–48。另參P.Y. Twang: “Indonesian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Transformation, 1940–1950”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7), 頁243–47，及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74–303.

⑤ 參見 Thomas Sowell: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Rac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83) 及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0).

⑥ 同註④Twang書，頁280–83。

⑦ “Manila Looks to Woo Investors”, *South East Asia Monitor*, vol. 2, no. 5 (1991), p. 171.

⑧ Adam Schwarz: “Piece of the Action: Indonesia Tries Again to Foster Indigenous Businessme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 May 1991), p. 39.

⑨ “Analysts See Malaysian Plan as First Step on a Tough Roa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 June 1991).

⑩ “Taiwan to Bolster Ties with Vietna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October 1991); “Viets Woo Investors for Zo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October 1991).

⑪ Murray Hiebert: “Flowers in the Dirt: Cambodia’s Private Businessmen Given More Leewa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 June 1991), p. 84.

⑫ Bertil Lintner: “The Odd Couple: Wartime Allies Forge Enduring Relationship”,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1 July 1991), p. 41; Editoria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8 October 1991).

⑬ “ASEAN Seeks to Flex Economic Muscl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8 October 1991); “ASEAN to Move towards Giant Single Mark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October 1991).

羅奇 譯

佐治希斯(George Hicks) 1936年在澳洲墨爾本出生，早年在墨爾本大學及倫敦經濟學院接受教育。曾任職於印度尼西亞國家計劃局、華盛頓國家計劃局、菲律賓大學等機構，其後在新加坡及香港任職於私人商業機構，常在《華爾街日報》及其他刊物發表有關香港的文章。